

國民政府北遷後蔣中正驅逐鮑羅廷之議

王正華

摘要

1926年12月廣州國民政府北遷之際，武漢政府在蘇聯顧問鮑羅廷（Michael Markovich Borodin）的主導下，實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左派所控制，造成中國國民黨革命陣營分裂的危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反對鮑羅廷並企圖驅逐他，成為關注國民黨前途的焦點。本文旨在探討國民政府北遷後到寧漢分裂前，蔣中正和鮑羅廷的衝突。

一九二〇年代中國革命運動中，鮑羅廷扮演重要角色，就國共兩黨對中國革命的立場而言，有關鮑羅廷所引發的爭議，更是值得探討。其中，蔣中正和鮑羅廷的關係，則是令人最感興趣且欲探討的主題。

本文將試從蔣中正的角度去觀察其反對鮑羅廷的問題，分從一、蔣中正驅鮑的倡議，二、陳銘樞的任務二大部分，探討蔣中正企圖驅逐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原委，並進而瞭解蔣中正在清黨反共前對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的立場和因應態度，並分析鮑羅廷的去留在中國國民黨左派、右派之間引發的爭議，以及對蘇聯援助中國革命的影響。

關鍵詞：蔣中正、鮑羅廷、國民政府

Chiang Kai-shek's Attempt to Expel Michael Borodin

Wang Cheng-Hua

Abstract

Whe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moved to Wuhan in December 1926, the Wuhan Government, under the coerce of the Soviet advisor, Michael Borodin, was controlled by bo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and the left wing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KMT), leading to the split of the latter.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decided to resist Borodin and intended to expel him from China.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flicts between Chiang and Borodin during the time.

Borodi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na's revolutionary history of 1920's. His attempt to disintegrate the KMT, aroused a great debate within the party. Of special interest is his relationship with Chiang Kai-shek.

The paper will first discuss Chiang's motivation and intention to expel Borodin, then explore how Chiang responded to the aid rendered by CCP in support of China's revolution before the started KMT purging of the party and anti-communist movement; second, the focus will be on the controversial status of Borodin in term of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left and the right wings of KMT. Finally, the impact of Soviet's aid on the revolution will also be discussed.

Key words : Chiang Kai-shek 、 Michael Borodin 、 Nationalist Government

國民政府北遷後蔣中正驅逐鮑羅廷之議

王正華*

壹、前言

1926年12月廣州國民政府北遷之際，武漢政府在蘇聯顧問鮑羅廷（Michael Markovich Borodin）的主導下，實為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所控制，造成中國國民黨革命陣營分裂的危機。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反對鮑羅廷並企圖驅逐他，成為關注國民黨前途的焦點。本文旨在探討國民政府北遷後到寧漢分裂前，蔣中正和鮑羅廷衝突的原委。

一九二〇年代中國革命運動中，鮑羅廷扮演重要角色，就國共兩黨對中國革命的立場而言，有關鮑羅廷所引發的爭議，更是值得探討。¹其中，蔣中正和鮑羅廷的關係，則是個人最感興趣且欲探討的主題。

本文主要根據國史館皮藏《蔣中正總統檔案》中的〈文物圖書〉項，包括《事略稿本》、《困勉記》、《省克記》、《愛記》，記述了1927年1至4月間，蔣中正處境的艱難及其進行驅逐鮑羅廷的心路歷程。又在〈籌筆〉中，保留一封陳銘樞的原函，詳細說明他當時返回武漢策動驅逐鮑羅廷任務，更對陳去職原委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此外，在〈革命文獻〉專題檔案中的『克復浙滬』、『奠都南京』、『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之(一)』也有可供參考的資料。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所翻譯，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俄羅斯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和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有關聯共（布）、共產國際對華政策的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中俄方面檔案的互為

* 國史館協修

¹ 有關鮑羅廷的研究，中文方面：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61年，再版）；丁言模：《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銀川：寧夏出版社，1993年）。外文方面：Lydia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Published for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by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9；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這些文獻探討的重點，一是鮑羅廷在廣州的活動，二是鮑羅廷與孫中山的關係，三是鮑羅廷與武漢政權的關係。

印證補遺，非常可貴。

本文將試從蔣中政的角度去觀察其反對鮑羅廷的問題，分從一、蔣中正驅鮑的倡議，二、陳銘樞的任務二大部分，探討1927年國民政府北遷後，在武漢和南昌的爭議中，蔣中正企圖驅逐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原委，並進而瞭解蔣中正在清黨反共前對共產國際援助中國革命的立場和因應態度。

貳、蔣中正驅鮑的倡議

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艦事件，是蔣中正和鮑羅廷關係轉變的關鍵。北伐後鮑羅廷在廣東煽動反蔣，12月國民政府北遷武漢，鮑羅廷更挾國民黨左派的力量，操縱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最高權力機構武漢臨時聯席會議，並進行「迎汪反蔣」運動，均導致蔣中正對鮑羅廷的心結。蔣中正最初力主政府遷鄂，按理後行的中央委員到南昌後，即應續往武漢，但對於武漢的情勢有所顧慮，部分中央委員即停駐南昌，遷都鄂贛的爭議演為革命陣營的分化。

為解決武漢與南昌當局對國民政府地點問題發生的歧見，蔣中正親赴武漢視察，溝通意見。1927年1月11日，蔣中正由南昌出發赴漢口，12日抵武昌，民眾開會歡迎，到者數萬人。在晚上公開的宴會席間，鮑羅廷警告蔣：「如果有壓迫農工反對CP的這種事情，我們無論如何，要想法子來打倒的！」²指責蔣袒護張人傑，視為黨中老朽，喪失革命精神，聲色俱厲，使蔣感受難堪，意在逼蔣消極辭退。³會後，蔣中正歎道：「席間受辱被譏，生平之恥，無踰於此！」又言：「為被壓迫而革命，不自由何不死？余決伸中華民族正氣，以救黨國，俾外人知華人非盡是賤者，而不可侮辱也。」翌日，蔣再歎道：「為何革命而受辱至此？」⁴17日晚與顧孟餘、何香凝談黨事，「不勝悲傷！」復與黃郛談政治，「亦惟沉痛而已！」⁵

蔣中正自武昌回後，對所受鮑羅廷之辱，即起去之而快的主張。19日過九江，第六

²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民國76年8月，影印2版），頁537。

³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4，〈文物圖書：事略稿本〉，《蔣中正總統檔案》（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毛筆件。

⁴ 王宇高等編：《困勉記》，5卷，頁11，〈文物圖書〉，《蔣檔》，國史館藏，毛筆件。

⁵ 《困勉記》，5卷，頁11，《蔣檔》。

軍軍長程潛謁談，直告之與鮑不能共事，他憤道：⁶

余與鮑羅廷不能相容！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復為余辱國？革命至此，尚受帝國主義與外人壓迫，何如及時解職，以謝國民與已死同志靈？

是日下午蔣中正上廬山，與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代理主席張人傑談，「不禁歛慨係之」。⁷

蔣中正20日在廬山晨起，思鮑羅廷唆使共產分子排外，引使英國交涉，歎道：⁸

余既不能為國雪恥，何忍為余辱國？今日情況，余惟有一死，以殉國難，為中華民族爭人格，為三民主義留精神，使全國同胞起而自救危亡！夫蘇俄解放被壓迫民族之主義，余深信其必不誤也；然而來華如鮑羅廷等最近之行動，則徒使我國人喪失人格，倍增壓迫，此與其主義完全相反矣。國人有知，應驅而逐之蘇俄同志乎？爾如誠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國際之信用破產，應急自悟，改正方法，不使恢復至帝國資本主義之道路，則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則余雖一死，不足救國，且無以見已死同志於地下！余惟願我全國同胞速起以圖獨立自主，不負總理三十年革命之苦心。余今精力已盡，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謝同胞！中華民族獨立自由萬歲！

蔣中正又言：「余自知初之誤信鮑羅廷之非，何敢再誤國民，以為萬世罪人也！」⁹是日午後，與張人傑、國民政府代理暨中央政治會議代理主席譚延闓談黨事，「感歎係之」。¹⁰翌日又痛斥鮑羅廷，「凡有正氣者，誓必驅而逐之」。¹¹26日，戴傳賢過談，「相對歎息」。¹²顧孟餘、何香凝、鄧演達、戴傳賢第二天過談，蔣中正言：「余必欲去鮑羅廷，使我政府與黨部得以運用自如。」孟餘等恐牽動大局，不敢決斷。蔣歎道：「書生辦事，則非至敗壞不可！」晚又與譚延闓、戴傳賢談至午夜，蔣謂：「余決去鮑，並遷中央黨部與政府於武漢，以應付時局。」¹³始得譚、戴二人之同意。¹⁴29日，

⁶ 《困勉記》，5卷，頁11-12，《蔣檔》。

⁷ 《困勉記》，5卷，頁12，《蔣檔》。

⁸ 《困勉記》，5卷，頁12，《蔣檔》。

⁹ 王宇高等編：《省克記》，1卷，頁10，《文物圖書》，《蔣檔》，國史館藏，毛筆件。

¹⁰ 《困勉記》，5卷，頁12，《蔣檔》。

¹¹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8，《蔣檔》。

¹² 《困勉記》，5卷，頁12，《蔣檔》。

¹³ 《困勉記》，5卷，頁12-13，《蔣檔》。

¹⁴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9，《蔣檔》。

戴傳賢、張人傑、譚延闓皆來，蔣中正與之詳談鮑羅廷事，當時「季怯而靜硬，組公則默默爾」。¹⁵蔣中正自省道：¹⁶

連日見諸同志，畏忌俄國，而不敢決然逐去鮑羅廷，余亦未免消極灰心。嗚呼！此我民族衰弱異甚之徵象也！余如再不奮發，以圖自強獨立，任令亡國滅種之慘禍，貽留於我全民之子孫，誠為萬世之罪人矣！至個人之成敗何足介懷！

蔣中正連日欲去鮑羅廷顧問名義不得贊助者，眾議認為將有礙聯俄革命。蔣則認為去鮑才可使中俄關係免於破裂，他三十日歎道：¹⁷

愁悶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環境之怯弱，幹部之無人也。然能立於革命地位，則一切揣測懷疑，可以不顧。夫橫暴如鮑羅廷，如不速去，大有障礙於革命。眾皆以為有礙俄交，余則以為惟願聯俄革命，所以必去鮑，以免兩國邦交破裂，否則亦何必去鮑哉？眾皆不知此理，一味畏縮，可歎！

蔣認為：「吾欲使政府與黨部貫通一致，故非去鮑爾（羅）廷不可，吾人當不顧外間之誹議，以期立於革命獨立之地位，橫暴如鮑爾（羅）廷不能速去，尚何能革命乎？」又道：「惟欲聯俄革命，亦非速去鮑爾（羅）廷不可，以其實為革命障礙也，否則何必汲汲去之。黨中幹部多不知原委，一味遷就畏縮，為可歎也。」¹⁸戴傳賢翌日勸蔣「須忍耐！」並言：「眾意皆欲公不可去鮑。」蔣表示：「余堅持前議，不可動也。」及見英報挑撥與蘇聯感情甚烈，蔣以此事適中帝國主義者之計，乃歎道：「余本決心去鮑，見此報，則知此事適中帝國主義之計，余亦惟有忍耐以待將來耳！嗚呼，處境之難，莫甚於今日焉！」不復言去鮑矣。¹⁹

1927年2月1日，蔣中正復與張人傑、戴傳賢、顧孟餘商議黨務及鮑事，他表示：「吾不願為帝國主義者所誹笑，寧屈己卑志，以求革命發展，故放棄主張，雖英國派兵恫嚇，日本想來妥協，皆毅然與之決鬥，生死成敗置之度外而已。」²⁰蔣中正3日下廬山，過九江，抵南昌，訪譚延闓、朱培德，「相見感慨無窮」。²¹當時為政府遷鄂問題，武漢和南昌僵持中

¹⁵ 王宇高等編：《愛記》，2卷，頁7，〈文物圖書〉，《蔣檔》，國史館藏，毛筆件。

¹⁶ 《省克記》，1卷，頁10，《蔣檔》。

¹⁷ 《困勉記》，5卷，頁13，《蔣檔》。

¹⁸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9-10，《蔣檔》。

¹⁹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9-10。《困勉記》，5卷，頁13，《蔣檔》。

²⁰ 《困勉記》，6卷，頁13，《蔣檔》。

²¹ 《困勉記》，6卷，頁1，《蔣檔》。

，第六軍軍長程潛4日致函蔣中正表示：²²

近時政治問題據傳聞甚複雜，然延擱不決，人心必至日益渙散，望公容忍一切，領袖群流，博採眾見，自處於調護地位，俾策軍事之進行。潛本下愚，對於政治毫無研究，然目見敵勢方張，內部似應一致，至於如何而後可以一致，是則運用者不可不思前顧後也。

宋子文與譚延闓也於6日來和蔣中正談，傳達鮑羅廷願來總司令部行營隨蔣而不問中央事，但蔣堅決表示要他回俄，謂「但可保全其顏面」。²³而漢口中央黨部連日開會攻擊蔣中正，蔣告訴自己要「忍辱負重」、「不伎不求」。²⁴

第七軍軍長李宗仁對於黨政中樞陷於膠著狀況，亦表示憂心，他9日向蔣總司令建議，請「毅然決定中央政府迅速仍遷移武漢，黨國前途實利賴之」。至於黨務問題，「俟軍事告一段落，再行嚴密整理，較為妥當」。²⁵而南昌政治會議已在8日作成決議，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至武漢。這時譚延闓有電致蔣中正商黨國事，蔣復示：「尊意中當遵守，無論何事，祇求黨能保持與統一而已。」²⁶20日，蔣中正與陳布雷談苦衷，又與譚延闓、何香凝談黨務，「但有殷痛而已！」²⁷蔣總司令23日致白崇禧的電文中，亦表達內心的痛苦，其道：「武漢情形複雜，痛苦不堪。」²⁸

蔣於25日得陳公博電，更瞭解武漢來電皆是詐術，「此全由鮑羅廷一人所驅使也」。蔣復與譚延闓、張人傑、黃郛談，其謂：「合中外共黨之力以攻我，使我內部糾紛，不能統一，鮑之罪不容於天地之間。」復歎：「國人奴性如此之重，無異於亡矣！」²⁹後聞漢口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等愈趨極端，蔣中正道：「疊按各電欺詐誘迫，無所不用

²² 「程潛呈蔣中正函」（民國16年2月4日），〈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17冊（民國16年2月），檔號16 0174，《蔣檔》，國史館藏。

²³ 《困勉記》，6卷，頁1；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12，《蔣檔》。

²⁴ 《省克記》，1卷，頁10，《蔣檔》。

²⁵ 「李總指揮宗仁呈蔣總司令佳電」（漢口，民國16年2月9日），『政治：一、奠都南京』，第26號，〈革命文獻〉（北伐時期），第26冊，頁34，《蔣檔》，國史館藏。

²⁶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14，《蔣檔》。

²⁷ 《困勉記》，6卷，頁1，《蔣檔》。

²⁸ 「蔣總司令致白崇禧漾亥電」（南昌，民國16年2月23日），『克復浙滬』，第96號，〈革命文獻〉（北伐時期），第10冊，頁126，《蔣檔》，國史館藏。

²⁹ 《困勉記》，6卷，頁3，《蔣檔》。

³⁰ 同上註。

其極，橫逆之來，令人難堪，黨國至此，其絕望乎？」商議處置辦法，並擬電告第三國際，他憤而認為：「鮑羅廷因為小人，而一般趨炎附勢，不知黨國為何事者，更可殺也！」³⁰這時蔣中正的處境困難，「憂患抑鬱，不堪言狀！」³¹南昌中央政治會議於26日致電第三國際中央執行委員會，請該會自動撤回代表鮑羅廷。³²28日，蔣再與各同志討論遷漢及驅鮑問題。³³

南昌與武漢的對立，導因蔣中正和鮑羅廷對中國革命領導權的爭執。蔣中正基於國民革命的領導是國民黨，不容共產黨篡竊代之，主張推展國民革命要奉行一個主義，實行一黨專政，以便統一指揮革命勢力，國民革命只能由國民黨來領導。³⁴北伐發動後，蔣中正派邵力子前往莫斯科和第三國際直接進行聯絡，希望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維持更密切關係。他認為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中國革命的領導是國民黨，在統一戰線的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國民黨是領導國民革命的政黨。³⁵共產國際遠東局並不贊成鮑羅廷的「倒蔣」作法，認為這會激化國民黨內部的衝突。³⁶1927年2月間，正在上海工作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主任維經斯基（Grigori N. Voitinskii，中文又名胡廷康）自上海到武漢與鮑羅廷商談對蔣政策，他不贊成革命陣營分化太快，曾前往九江尋求蔣總司令妥協，試圖化解武漢與南昌的對立，但無功而返。³⁷維經斯基再要求莫斯科召回鮑羅廷，因蔣中正「不會做出任何讓步」。³⁸

據蘇聯檔案，蔣中正和維經斯基於2月22日、23日在九江進行會談，蔣表達了南昌和武

³¹ 同上註。

³² 「第64次政治會議議事錄」（民國16年2月26日），頁2，〈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紀錄〉，檔號：00-1/32，油印件，《黨務會議紀錄及組織專檔：中央政治會議檔》，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以下簡稱黨史館）藏。

³³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34-35，《蔣檔》。

³⁴ 郭恒鈺著：《俄共中國革命秘檔（1926）》（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6年3月，初版），頁215-216。

³⁵ 同上註書，頁175-177。

³⁶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6年3月），頁113。

³⁷ 《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6月，1版），頁307。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1974年，2版），第2冊，頁580-581。民國15年中山艦事件後，蘇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成立「共產國際遠東局」，維經斯基是三人小組之一，6月18日起開始工作。9月向莫斯科駐共產國際蘇共（布）中央代表團提出對中山艦事件的調查報告，並寫信要求召回羅鮑廷。郭恒鈺前引書，頁109、114-115。

³⁸ 「The Letter from Shanghai」(March 17, 1927), 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Paragon Book Gallery, 1962), p.406.

³⁹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維經斯基和蔣介石在九江的談話記錄」，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

漢的衝突要由鮑羅廷負責，因為鮑執行了分裂國民革命運動的政策，蔣說：³⁹

我個人對鮑沒有任何惡感，我迄今為止一直把他當作老師看待。但我現在反對他，因為他在堅持會造成兩個政府的危險方針。

我認為這不是共產國際的方針，因為這種政策會在中國人民的思想中造成對共產國際的不信任。這不僅在我們國家，而且在東方各被壓迫國家都會有反應。

帝國主義者對鮑的離去作何解釋，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決根本問題——國民黨的內部問題。

蔣問維經斯基：⁴⁰

共產國際持什麼方針？共產國際是否主張國民革命運動分裂？如果不是，那麼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鮑為什麼實行這樣的政策呢？我認為他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持客觀的態度。他在這個問題上非常主觀。這會破壞共產國際在中國人和一切東方弱小民族心目中的威信。即使我現在反對鮑，也不等於我反對共產國際。

政府任何時候都可以遷往武漢。但有兩點很重要：一、遷政府同鮑離開有關係，二、必須在黨內確立嚴格的紀律。

據《蔣中正總統檔案》中所記兩人的談話，蔣請撤去鮑羅廷，蔣問維經斯基：⁴¹

君之主張使本黨分乎？合乎？使政府遷武漢？抑駐南昌？總之，本黨糾紛皆由鮑羅廷一人所起，故政府遷期必待第三國際撤回鮑氏，與鮑氏回俄以後，始能定耳。

造成國民政府鄂贛之爭的責任，是蔣？還是鮑？從兩人談話內容，尤其是蘇聯檔案中所保留的紀錄來看，蔣對維經斯基的剖白，一方面透露蔣對鮑羅廷不滿的癥結所在，更重要的意義在於一位對共產國際賦予信賴的所謂「被壓迫國家」的革命領導者，提出了對共產國際作法的批判，觸及民族主義的問題，這是過去我們所忽略的。

蔣鮑之爭其後根本的問題，則在於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掌控，所以對蔣不信任，並破壞蔣名聲。除了鮑羅廷，維經斯基早在一月間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俄國代表團的信中，即報

《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11月，1版），頁133。

⁴⁰ 同上註書，頁133-134。

⁴¹ 「2月23日，晚，往訪譚主席，與第三國際代表胡定康談話。」，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33。但談話詳細內容見《困勉記》2月24日條，6卷，頁3，《蔣檔》。

⁴²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1月21日），《聯共（布）、共

告蔣「明顯企圖改變政府的方針，使之右傾」，並建議以汪兆銘與之抗衡。⁴²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駐中國代表阿爾布列赫特也在二月間指蔣：「他竭力與國民黨右派和買辦結成聯盟，甚至還公開同日本司令部進行談判（他的代表戴季陶在日本），而且還通過日本人同張作霖談判劃分勢力範圍問題」。⁴³難怪蔣中正當時質問維經斯基：「共產黨人在攻擊我，您是否聽到了他們散布的謠言，說我成了軍閥，是獨裁者，想同蘇聯斷絕關係，要同日本人妥協？」⁴⁴

自黨政中樞北遷後，鮑羅廷即得莫斯科的支持，將汪蔣合作轉為迎汪聯唐反蔣，聯共中央局不僅批駁遠東局撤換鮑羅廷的意見，並明確指示鮑羅廷在武漢負責一切政治上的決策，並擁有軍事上的決定權。⁴⁵鮑羅廷不過是莫斯科政策的執行者，他發展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的勢力，和蔣中正發生直接衝突，他也把和蔣的分歧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報告，並得到指示：⁴⁶

一、不要突出鮑羅廷，“免得人們認為這場衝突是鮑羅廷和蔣介石之間為爭奪影響而進行的鬥爭”。

二、不要把事態發展到與蔣介石決裂的地步，以蔣介石完全服從國民政府為限。

蔣中正和鮑羅廷對北伐戰略的主張不同，亦造成兩人的不和。蔣中正主張進攻浙江和上海，而鮑羅廷認為是錯誤的，認為河南決定北方戰局的成敗。⁴⁷

在莫斯科的立場，並不希望蔣總司令從革命陣營分裂出去。然蔣總司令視鮑羅廷為破壞國民革命的最大阻力，鮑羅廷與共產黨亦敵視蔣總司令為進行共產革命的最大障礙，此後雙方已無妥協餘地。

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頁94-95。

⁴³ 「維經斯基給聯共（布）駐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代表團的信」（1927年2月25日），《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頁125。

⁴⁴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維經斯基和蔣介石在九江的談話記錄」，《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頁134。

⁴⁵ 楊奎松前引書，頁115。

⁴⁶ 「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會議第87號（特字第65號）」，《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頁118。

⁴⁷ 同上註書，頁119。

叁、陳銘樞的任務

當南昌、武漢僵持不下之際，蔣總司令派陳公博探詢武漢方面各人的意向。武漢中央則在1927年2月24日會議，擬具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重要議案大綱，派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陳銘樞隨陳公博回贛疏通，徵求蔣的同意，蔣總司令反說服陳銘樞曉對反共的支持。

⁴⁸陳銘樞回漢復命，蔣中正將親函交付他策動武漢要人驅逐鮑羅廷的任務。

陳銘樞到武漢後，3月2日先訪孫科，轉達蔣總司令驅鮑的意思，孫科初表示可負責去鮑，「如此則一切糾紛均迎刃而解」，鮑羅廷也經向孫堅決表示：必去他亦可，「向中央各同志疏通，必可辦到，不過須經過會場正式通過手續。」⁴⁹翌日，陳銘樞和宋慶齡、宋子文討論，「均於去鮑無異辭」。午後，陳銘樞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來談，鄧主張汪兆銘回然後鮑去，陳表示：「一面鮑去，一面汪回，兩屬無礙。」鄧亦表示同意。陳銘樞復與李宗仁討論良久，李宗仁認為鮑顧問是總理孫中山請來，又係第二次代表大會禮聘的，話即中止。⁵⁰4日午前，陳銘樞奉蔣命見鮑羅廷約談一時，討論如何能安全回國，準備得鮑同意，即由武漢方面發表蔣的驅鮑宣言。⁵¹

然武漢方面詎料情勢發生變化，是日未見蔣總司令宣言發表，徐謙、吳玉章、顧孟餘、鄧演達、陳友仁等在孫科處開會，引陳銘樞入座，鄧演達「意氣豪甚」，其他均現「譎厲態度」，惟孫科「貌現不安」，陳質言總司令宣言何以尚不發表。⁵²會議上多數人反對撤換鮑羅廷，徐謙主張為了「照顧蔣介石的面子」而撤換鮑，但吳玉章強硬反對，他表示：「這不是面子問題，鮑羅廷是否要換，應由大多數中央委員來決定，蔣介石一句話怎能算數！。究竟是蔣介石服從中央呢，還是中央服從蔣介石？再說鮑羅廷的話根本沒有錯誤，憑什麼理由要撤換他？這不是鮑羅廷個人的去留問題，這是蔣介石對中央、對政府的蔑視。我們一定不能讓步！」⁵³顧孟餘繼言不宜為發表理由，均不值一駁。但在座各位均發露不信任蔣總司令

⁴⁸ 王正華：〈國民政府北遷鄂贛之爭議〉，《近代中國》，第114期（民國85年8月31日），頁107-108。

⁴⁹ 「蔣中正電譚延闓接陳銘樞函感言特抄該函與諸同志閱」（民國16年3月10日），〈籌筆〉（北伐時期），檔號：2010.10/4450.01-006/70，《蔣檔》，國史館藏。

⁵⁰ 同上註。

⁵¹ 同上註。

⁵² 同上註。

⁵³ 吳玉章：〈第一次大革命的回憶〉，《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1版），頁141。

言意，「狀甚冷酷」。陳知不可以口舌爭，乃顧鄧演達云：「總座係命交總政治部發表的，總政治部乃受總座命令者。」鄧不得目顧諸人取決。吳玉章云：「如要發表，可由陳同志私人持交言論界發表，黨不宜為之負責發表。」⁵⁴孫科是時心大不安，力持須即發表，但出語時「氣懾聲澀」，並無意露出一言：「電話問鮑先生」。諸人作如未聞見，亂以他語，孫科會意而止。則此中情形，「諸人反對蔣總司令意見堅決，孫科出於被動昭然為見矣。」旋孫科以打電話請報館登載敷衍亦未刊行，陳至此乃大為悔恨。⁵⁵最後會議決定不接受蔣中正撤換鮑羅廷的理求。⁵⁶

又先前第四軍軍黨部開幕，鄧演達、孫科演說，又復激烈萬分，討好鮑羅廷，張發奎及其各師長亦然，各處團體會場均明目對蔣總司令攻擊。且陳銘樞去南昌之日，總指揮召集西路軍高級軍官會議，有鄧演達在座，所討論者並非軍事，乃要人發表對於此次黨務問題意見。唐、鄧發言，舌如鋒刺，固不待說，張發奎亦聲明服從鄧主任所指導，絕對擁護黨的權威。綜觀各方面情形，總對於蔣總司令攻擊，步進一步，決無調停餘地。見唐、鄧與四、八兩軍已合同一氣，集中岳州之軍隊日向武漢調來，對於蔣總司令命令各軍出發之電置若罔聞，並無動作，其坐視東南之急，不救之心理，昭然如揭。⁵⁷而此時陳銘樞非特失了調停作用，且以態度隱約，故疑忌伏，且陷於孤立圍逼之境。又復失了先著，思若不見機而作，必將貽全軍之危險，故決意即時引去。4日夜上蔣總司令電云：此間空氣仍惡，期決不遷就。是夜10時，在鮑羅廷預為安排下，唐生智派人逼陳銘樞表明支持武漢意見，否則去職，陳深刻體認到「鮑必去，黨不亡」。⁵⁸5日陳銘樞將武漢使命失敗通知蔣，雖然情勢險惡，蔣總司令6日電示陳銘樞：「空氣緊張，無足為慮，應以鎮靜處之。」⁵⁹陳銘樞終於被迫離漢。

3月4日，蔣中正正在開會中諄諄演講，以黨亡為憂，議畢道：「黨員散漫，團結不能，已為敵黨各個擊破乎？被人強迫，惟有忍受革命云乎哉！」5日，復云：「漢方日逼日緊，倒行逆施，無所不至，余之窮境，或將陷於莫須有三字之地！惟有黨存與存，黨亡與亡，一息

⁵⁴ 「蔣中正電譚延闓接陳銘樞函感言特抄該函與諸同志閱」（民國16年3月10日）。

⁵⁵ 同上註。

⁵⁶ 吳玉章前引文，頁141。

⁵⁷ 「蔣中正電譚延闓接陳銘樞函感言特抄該函與諸同志閱」（民國16年3月10日）。

⁵⁸ 同上註。

⁵⁹ 「蔣總司令致陳銘樞轉朱紹良魚辰電」（南昌，民國16年3月6日），第2號，〈革命文獻〉（北伐時期），第13冊，『寧漢分裂與北伐中挫之(1)』，頁21，《蔣檔》，國史館藏。

尚存，此志不懈而已。」⁶⁰蔣復歎道：⁶¹

前線將士忍凍耐疼，作戰拼命，而武漢共黨以及本黨敗類，乃造謠惑眾，毀壞詆誣，無所不至，必欲使東南計畫失敗，國民革命不成，以逮其亡黨賣國之目的！余之境地已陷於史可法、岳武穆、文文山之窮境矣！嗚呼！古今賢豪忠貞之士，受屈於奸黨之手，蓋如出一轍也。

南昌方面決定政府遷鄂，譚延闓、何香凝、李烈鈞、丁惟汾、陳果夫五委員3月6日啟程赴漢，武漢第八軍軍長唐生智即於當日逼支持蔣總司令的陳銘樞去職。唐生智自兼武漢衛戍司令，第四軍副軍長張發奎兼代第十一軍軍長，武漢及兩湖地區完全為左派勢力控制。⁶²武漢當局即由徐謙、鄧演達、孫科、顧孟餘和吳玉章五人組成一行動委員會，作為領導機關，發表宣言和宣傳，要求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農工運動和迎汪復職，實則為反對蔣總司令。⁶³蔣知道唐生智竟與鄧演達「狼狽為奸，叛跡益露」，慨道：「處境困難，已至極點，似有非解職不可之勢，革命至此，痛心盍極！」⁶⁴

武漢三中全會10日召開，完全被左派勢力操控，限制蔣總司令兵權，妨礙軍事進行。蔣自記：「武漢方面壓迫異甚，使人難堪，余當時自省克，惟有忍耐而已。」⁶⁵蔣中正16日抵九江後，翌日聞武漢搗亂益烈，其道：「彼輩亡國亡黨，在所不恤，而以必倒中正為快，亦多見其不自量也。」⁶⁶18日聞武漢中央會議議決案，多令人難堪，蔣警惕自己：「壓迫侮辱至矣，然為黨為國計，惟有服從耳。」蔣中正驅鮑之計失敗，只有暫時服從武漢當局，乃致電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Galen，原名布留赫爾 Vasiliy K. Blyukher）略謂：「關於武漢方面軍政黨務之意見，請隨時見告，中正只求於革命有利而已。」⁶⁷並告譚延闓：「以後對於黨政諸事概不發言」，請加倫在漢代為解決一切，以表明態度。⁶⁸

⁶⁰ 《困勉記》，6卷，頁4，《蔣檔》。

⁶¹ 同上註。

⁶² 王正華前引文，頁109。

⁶³ 吳玉章前引文，頁141。

⁶⁴ 《困勉記》，6卷，頁5，《蔣檔》。

⁶⁵ 《省克記》，1卷，頁11，《蔣檔》。

⁶⁶ 《困勉記》，6卷，頁6，《蔣檔》。

⁶⁷ 《困勉記》，6卷，頁6。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頁44，《蔣檔》。

⁶⁸ 「蔣中正電復譚延闓以後對黨政諸事概不發言已電嘉倫將軍在漢代解決」（民國16年3月19日），〈籌筆〉（北伐時期），檔號：2010.10/4450.01-006/89，《蔣檔》。

蔣中正自從一月下旬訪武漢回，瞭解無法和鮑羅廷共事革命，主要的理由是對國民革命領導權的維護，強烈表現蔣追求中國革命獨立自主的發展，以及其民族主義的精神。蔣中正力圖和在南昌的同志包括張人傑、戴傳賢等人商議，希望請第三國際撤回鮑羅廷，但都不敢作決。蔣中正更進而私下請陳銘樞回武漢時，策動武漢方面撤換鮑羅廷，非但事敗，陳銘樞反因而去職。武漢三中全會為鮑羅廷與共產勢力控制，蔣中正不願見國民黨分裂，只有暫作隱忍，表示服從。

3月26日蔣中正進駐上海，儼然形成反共中心，引起武漢方面的疑懼與不安，對於滬寧政局的發展更無從控制，而蔣總司令在24日南京事件後數度發表外交主張，也和武漢反帝政策不合，更致不滿。就在上海召開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會議的同時，武漢中央4月2日亦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認為上海已形成「反動中心」，會中決議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訓令蔣總司令立即離開上海，回到南京，專負軍事方面責任。⁶⁹

武漢軍事委員會常會4月4日決議取消總司令，改為集團軍總司令，主要目的即在剝奪蔣中正最高軍事指揮權，而與馮玉祥並列為集團軍總司令。⁷⁰當汪兆銘4月1日至5日停留上海期間，曾與蔣中正、吳敬恆、蔡元培、李煜瀛等討論黨務糾紛，意見不一，眾人希望汪贊成趕走鮑羅廷與分共，蔣中正力主此兩點必要馬上實行，汪兆銘則以為政策關係重大，即使要變，也應該開中央全體會議來解決，故提議在南京召開第四次全體會議。⁷¹汪兆銘旋赴武漢和鮑羅廷合作，蔣中正在反共黨人的支持下，黨政中樞在南京成立，蔣中正最後終於和共產勢力決裂。

⁶⁹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屆常務委員會第5次會議（擴大會議）速記錄」（民國16年4月2日19時），頁218，〈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2屆常務委員會第1至第10次會議速記錄〉，《黨務會議紀錄及組織專檔：中央執行委員會檔》，油印件，檔號：24/13，黨史館藏。

⁷⁰ 「國民政府秘書處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民國16年4月11日），毛筆原件，《一般史料》，檔號：441/40，黨史館藏。

⁷¹ 〈武漢分共之經過〉（民國16年11月5日），汪精衛著，恂如編：《汪精衛集》（上海：光明書局，民國19年5月15日，3版）；《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上海書局，1992年12月，1版），3卷，頁225-226。

肆、結 論

國民政府1926年底北遷，武漢黨政被共產黨把持，革命陣營面臨嚴重的問題就是因聯俄容共帶來的國共衝突，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和蘇聯顧問鮑羅廷對中國革命領導權之爭，演成革命陣營的分化。

蔣中正到南昌後，決定將黨政中樞暫留南昌，發生鄂贛對峙局面。蔣中正為解決爭端，16年1月親赴武漢溝通，但受到鮑羅廷的侮辱，不能再與之相處合作，也唯有鮑去職，政府和黨才有可能自主，遂決定先行驅逐鮑羅廷。先和程潛討論，復與張人傑、譚延闓二位主席研商黨務，並無具體辦法。1月底，蔣中正連日和戴傳賢、顧孟餘、何香凝等討論逐鮑羅廷事。蔣中正認為要維繫聯俄革命，非去鮑不可，但眾人皆以為不然。蔣又恐怕英國從中挑撥中蘇感情，只有暫時隱忍下來。2月以來，蔣中正繼續徵求黨內同志對去鮑的支持，仍無結果，將領程潛、李宗仁先後勸蔣容忍，或等軍事告一段落後，再行整理黨務。

武漢三中全會召開前夕，蔣中正即派陳銘樞回武漢運作驅鮑。只要鮑同意回國，蔣中正願保證其安全，然後由武漢方面發表蔣的驅鮑宣言。但武漢中樞幾為國民黨左派勢力所控制，唐生智、鄧演達、張發奎等也不支持蔣。陳銘樞不僅去鮑任務失敗，自己則在鮑羅廷的安排下，為唐生智迫離，釋去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職。3月，武漢召開三中全會，蔣中正去鮑不成，為求黨的保持與統一，只有表示服從之意。

蔣中正因鮑羅廷的刻意打壓，決意驅逐鮑羅廷時，從其自述的資料顯示，他孤立奮戰，內心遭受很大的痛苦，固然事關個人榮辱，從其內心對鮑羅廷的批評，強烈表現追求革命的獨立自主發展，以及民族主義的精神。但他並無意和第三國際決裂，也不是要修正聯俄革命的路線。直到3月24日，還電請維經斯基和加倫來京滬協助。對於黨務上的國共紛爭也多有討論。蔣中正當時對驅鮑非常堅決，但對共產黨的處理尚無決心。驅鮑失敗後，蔣中正為了維護黨的統一，對黨務糾紛的處理一度陷於躊躇。4月上海國民黨內部反共會談之後，蔣中正清黨反共，和鮑羅廷的關係完全破裂。

蔣中正和鮑羅廷最後的衝突，不僅是個人的恩怨，北伐戰略的分歧，權力之爭的問題，實際代表的是和共產國際的衝突。諷刺的是，蔣中正至少在清黨反共之前是相當信賴聯共（布）和共產國際的，但不過是其達成共產革命所運用的棋子，一旦不聽其指揮，即加以打壓。過去指責蔣中正是中國革命陣營分裂的破壞者、背叛者，是站在莫斯科的立場。檢討聯共

(布)、共產國際領導世界革命的歷史經驗，在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是不是自己也成為另一種型式的「帝國主義」？其對於所謂援助「弱小國家」、「被壓迫國家」的真正用心是值得去深思的。況且，這些被其援助的國家，是不是也應該有其自己的國家立場呢？

徵引書目

(一)檔案文件

《蔣中正總統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孫詒編，《民國16年之蔣介石先生（1月—3月）》（遵訂稿(1)），〈文物圖書：事略稿本〉，毛筆件。

王宇高等編，《困勉記》，卷5，〈文物圖書〉，毛筆件。

王宇高等編，《省克記》，卷1，〈文物圖書〉，毛筆件。

王宇高等編，《愛記》，卷2，〈文物圖書〉，毛筆件。

〈特交檔案：一般資料〉，第17冊（民國16年2月）。

『政治：一、奠都南京』，〈革命文獻〉（北伐時期）。

『克復浙滬』，〈革命文獻〉（北伐時期）。

〈籌筆〉（北伐時期）。

《黨務會議紀錄及組織專檔》（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紀錄〉，檔號：00-1/32，油印件。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屆常務委員會第一至第十次會議速記錄〉，檔號：2.4/13，油印件。

《一般史料》（中國國民黨黨史館藏）

「國民政府祕書處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函」（民國16年4月11日），檔號：441/40，毛筆原件，。

(二) 中文書籍

- 郭恒鈺，《俄共中國革命祕檔（1926）》。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國86年3月初版。
-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國民革命運動（1926-1927）下》。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11月初版。
- 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權》。臺北：傳記文學社，民國61年再版。
- 丁言模，《鮑羅廷與中國大革命》。銀川：寧夏出版社，1993年。
- 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臺北：中國學術著獎助委員會，民國55年5月初版。
- 《鮑羅廷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6月初版。
- 吳玉章，《吳玉章回憶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78年初版。
- 張國燾，《我的回憶》。香港：明報月刊社，1974年2版。
- 汪精衛著，恽如編，《汪精衛集》。上海：光明書局，民國19年5月15日3版；《民國叢書》·第四編。上海：上海書局，1992年12月1版3卷。
- 楊奎松，《中共與莫斯科的關係（1920-1960）》。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6年3月。

(三) 論文

- 王正華，〈國民政府北遷鄂贛之爭議〉，《近代中國》，第114期（民國85年8月31日）。

(四) 西文資料

- Lydia Holubnychy, *Michael Borodi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3-1925*, published for East Asian Institute : Columbia University by 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1979.
- Dan N. Jacobs, *Borodin : Stalin'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The Letter from Shanghai」, March 17, 1927, Leon Trotsky, *Problem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New York : Paragon Book Gallery, 1962.